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五五期 ——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8c)

【往事非烟】	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之一）	扬子浪
【劫后反思】	宋彬彬道歉之后	启之
【史海钩沉】	“伍豪事件”的原委	阎长贵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之一）

• 扬子浪 •

前言

笔者在这里公布的是在文革中，在风暴中心北京大学记下的真实日记。

笔者的本名谢定国，1945年生，出身于上海一个普通商业“资本家”家庭。当年每次填出身写这三个字时，觉得特别铜臭，现在再写，想想那些红色权贵豪富，又觉得特别寒碜。我在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六年制），1968年12月毕业。毕业证书由北大军宣和工宣队盖章颁发，是一本五寸大小的红色小本。内页是毛泽东的军装像，他和林彪的语录，印制低劣，设计粗鄙，堪称世界高教史上的奇观。扬子浪是我在北大参加文革撰写大字报时用的笔名。我写文革大字报，用的笔名寄情山水，而不是“毛林陈之兵”、“二十八团”等，是我回忆那个荒唐年代时不多的稍感欣慰的事情。

笔者在整理日记时，对明显的错别字，作了更正；还增补了一些标点符号，以利读者阅读。在那些极端亢奋的日子里，笔者有时还把月份搞错，对这些我也作了勘正。日记中牵涉的人物，凡是有可能引起困扰，误解和争议的，我都用了化名。此外有些内容与文革和我当时的思想情

绪关系不大的，则作了一些删节。至于文句欠通，断句不妥，用词不准，我则基本保留，因为这些或许也是时代和我当时心境的反映。

可惜的是公布的日记仅起于 1966 年 8 月 5 日 止于 1968 年 2 月 2 日。1966 年 8 月 5 日前的那本日记在多次的搬家迁移中不幸遗失。1968 年 2 月后，则因为北大两派的对立冲突越演越烈，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自己对文革的前景感到幻灭，又不敢在日记中记下任何怀疑和政治不正确的想法，就停笔不记了。

把文革日记公布，是件颇难堪的事，笔者为此犹豫了多年。但随着年岁日增，已近古稀，我自忖与其把它带进坟墓，不如公诸于世，让世人看到一个大学生青年在那个疯狂时代，在风暴中心的情感和思想。他的幼稚和狂热，他的思索和挣扎，他的困惑和迷茫，他如何在绝对权力设下的思想牢笼中东冲西突，企望为现实中发生的非常事件，找到政治正确的合理诠释；这一切既是他的故事（His story），也是历史（History）。

笔者也难免自问：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能读懂那个时代的人的日记吗？能理解一个学生青年在那个癫狂年代的情感和思想吗？我不知道。先哲早就讲过，一个人是不可能涉过同一条河两次的，此处和彼处，此河已非那河，何况相隔一个时代。

但渴求被人理解是人最强烈的原始冲动之一，我在这里要多写两段，冀望后人的些许理解。

在一九六五年二月日记中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日记应该记些什么呢？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日记是不能让人看的，因为就像一个人的裸体不能给人看一样。又有人说：日记应该记下一个人的“真实思想情感”，这种提法都是错误的。日记不应该写“真实”，不应该自然主义地描绘人的裸体，这实际上就是提倡兴趣盎然、津津有味地记下自己脑海中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活动。日记应该记下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日记应该记下自己在这个伟大时代中丰富多彩的生活，最高目的是向雷锋学习记下自己红色的历史。

很多人在那个年月，记日记就是为了给组织看，是入党入团的思想汇报。更多的人，则是不敢在日记中记下真实的思想情感。因为记下，就是认可，就是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投降。更何况任何政治不正确的话，一旦被看到、查到都可能带来麻烦。

生物系的樊立勤同学在北大文革中十分活跃、他出足风头，也受尽磨难。在对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谈话时，他说：面对“文革”前夕的高度紧张和非凡压抑，“我宁愿回到‘文革’十年，也不愿意回到‘十七年’”。在严密的党团组织的无孔不入的控制下做驯服工具，当一颗没有人性的螺丝钉，还是当文革初期怀疑一切，革命造反的“小毛泽东”（王若望语）？我想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会和樊立勤一样选择后者，这就是为什么文革宣传一点就着，青年学生革命造反的狂飙在文革初期像热核爆炸一样震撼全国。

文革的发动是驯服工具论的终结，文革的结束则是宣扬阶级斗争和崇拜革命造反的终结，这两个历史的转折都充满了中国历史特有的戏剧性。中国历史的长河或许真如黄仁宇所讲已经冲出了三峡，前面尽管还有曲折跌宕，但已经相对平坦舒缓。

这是我对故国的良好愿望，但我不肯定。历史无绝对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客观规律只不过是她的前身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变种，她们似乎并不存在。

笔者对日记只加了最必要的注释。不熟悉文革历史、北大文革历史的人可能很难把日记中提到的人物，团体和事件连贯起来，特别在日记中又使用了不少略语。如果有读者希望了解更多的日记背景和有关人事的详情，可参阅 Andrew Walder 著的一篇论文“1966—1968 年北京大学红卫兵的派系冲突”。原文是英文，发表在“China Quarterly” 2006, 188, 1023—1047。后由严飞翻译成中文，登在《当代中国研究》Vol. 20, No. 1, 2013。我很惊讶这么一篇详尽的文章居然是一个老外写出来的。尽管其中有些细节有误，但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北大文革回忆录相比，比较全面和客观，实在可以称得起信史。

日记正文

一九六六年

8月5日

早晨，空气清新，阳光灿烂。

我又记完了一本日记，我又开始了新的日记，我又开始了我生命新的一天。我将继续努力，继续前进，与一切资产积极消极颓废思想作斗争，争取做一个革命者，做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至少做一个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人。

上一本日记记载了1965年11月25日至1966年8月4日250天内在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190天是参加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载，60天是目睹和参加更加伟大，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程有极其深远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作为和思想来说，前190天的记载比较好，而后60天就相对要差劲了。

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还一个都没完成，我还可以弥补损失，我还可以大有作为。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同志努力啊！莫懈怠。

只有紧张的生活才是使人发奋的生活，懒散无所事的生活让人厌倦，他会窒息我的上进心，我的克服困难的革命战斗精神。

让我永远永远记住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战斗诗篇“沁园春”（长沙）吧！

沁园春 长沙 一九二五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昨天晚上8点在东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揭发批判张承光张承先，张德华的错误路线。我们尊敬的朱委员长，诙谐风趣的康生同志，感情炽烈的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出席了我们的会议。大会同学发言结束后，江青同志首先讲话，她那振奋人心的讲话，干脆利落不带丝毫折中主义的讲话，每个字后面都有着千军万马的力量的讲话，（尽管她讲话的声音并不响）和她富有最强烈的感情表现力的动作都获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江青同志，你对于我们北大同志是多么亲切啊！是你五下北大来，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直接带到了群众之中！

你一开始就要我们警惕张承光张承先，张德华之流挑拨离间的分裂阴谋，号召我们全校革命师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团结起来，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开火。

你劝告工农革干子弟不要听信坏人的流言蜚语，要到群众中去，到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去，不要另立什么协会，这是分裂活动。

你一句手一投足，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为你的演讲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过去习惯于用舞台腔，演员腔指责一些同志装模作样的讲话，而我今天不仅要赞赏你的发言具有最深刻最睿智的政治家的敏锐和思想，并具有一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的风度。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杰出的妇女，甚至从来没想到过如此杰出的妇女，你不愧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人。从你身上发

射出的辉煌、灿烂的光芒中，我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讲完后在同学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江青像一个演员一样以180度的发射角，不时地向同学们点头，鞠躬。并且不时地用双手整理头发。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江青同志是一个出色的，演得有声有色的演员。

如果说江青同志是以演员的深刻来表演他的思想的深刻话，那末康生同志是以朴素、诙谐、出奇不意的反诘显示了他思想的深刻。

康生同志告诉我们是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6月1日下午四点毛主席打电话给康生同志，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且命令6月2日全国报纸一律刊登聂的大字报。康生同志说这下，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因为我是支持聂元梓的。这篇大字报一发表，全北京就炸开了，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真正的群众运动。

康生同志说：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在讲了巴黎公社第一次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炬后，两次指出，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他指出“6.18”后张承先在北大实行的是白色恐怖。6月20日张承先的二十天工作总结和关于“6.18”的情况报告是反革命文件，是镇压革命的文件。张承先到北大不是来发动群众、来搞革命的，是来扼杀群众运动，镇压革命的。

康生同志当面严厉地责问了张承先，张也就从台中央的凳子上滚到了台边的角落里站在那儿了。有一个狂徒竟写条子责问，警告中央首长，说：不准违反毛泽东思想，不准搞逼供信。康生同志机智地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击，揭露，压下了这张条子的气焰。

朱德委员长在大家再三的要求下也讲了话，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已经有些“老”了。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北大两个月的斗争说明了这一点。康生同志还透露毛主席最近给清华的“红卫兵”写了封信号召他们到群众中去，做群众的核心。

陈伯达同志把那幅著名的对联修改了，修改后的对联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横批：应该这样。

这幅流行了两个月的对联应该换个模样流行了。

昨天开会，江青发言时，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员，文革会宣传部长彭小蒙怒不可遏，跳上台去，抽了张承先一个耳光，然后就用手臂蒙着脸哭了。慌得周围的纠察队员急忙把她按住。大会结束后，张承先、张德华在一片叫打声中，在四个纠察队员的“保护”下夹着尾巴溜走了。

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水很热，又闷，很不安逸，下次应该最好挑下雨天去游，浪大水净人少，比在阴天里在昆明湖这个池塘里泡好多了。

8月8日

昨天章晴丽和他化工学院的两个同学来我校参观，上午我给他们介绍了北大的情况，下午我们四个去清华参观，看到了清华同学给王光美贴的好几张大字报。从清华出来，章的两个同学走了，我和她一起用了晚餐，出来后再在五道口俱乐部，看了电影《白山新歌》。本来一切都很好，但是她突然问我一句你什么出身，我据实答了，我显得很窘迫，她也十分不自然。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胆小怕事懦弱无能呢？家庭的包袱怎么会压得我这样惨呢？难道我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吗？我厌恶极了，厌恶自己如此缺乏革命性。不过我的地位的确也够矛盾的。我要革命，要一斗，二批，三改，首先要自己站得住脚，如果自己也站不住，那怎么去战斗呢？

不要没有打倒黑帮，反而把自己打倒了。当然旧的应该彻底打倒，但是如果把我的一切都打倒怎么办呢？“怕”的枷锁把我禁锢了。看来我只能去辩论，而没有勇气去闯，去造反，因为我经不起审查。

在生命的历程中一步一步达到了“第四高度”的古丽雅[1]，懂得顺水而下的危害性，顺水如行船，终向下游去。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几天，天津、内蒙、呼和浩特、上海都有同学来北大访问、参观，这是真正的学生运动的气象。特别是许多天津同学骑着自行车，从天津来北大，还有许多同学是步行几十里甚至100里来北大的。

8月9日

昨晚8点半，广播了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校同学欢欣雀跃，表示坚决拥护这一决定。

深夜十一点，我们结队一千余人去人大游行，欢呼中共中央决定，后又至外语学院，直至清晨2点才回校。昨天接到文美一封信，她已经报名去新疆了，不过我想她是不会被批准的，哎！现在是人越青年，框框越少、越敢作为。而我自己给旧文化束缚得很难自由了，在这点上我应该向我的妹妹学习

北大外出的串联同学到处被咒骂，也到处被赞扬。赞扬的围着叫北大革命师生万岁，称我们为“北京公社”宣言的发起者，称北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圣地，全市高等学校的先锋旗帜。地质学院的同学甚至于抄了一首主席诗词送给北大去串联的同学（咏梅 卜算子）。而商学院则是反对的另一个典型。他们贴了许多大字报，驳斥、攻击去串联的物四（一）同学，还呼吁我们广大师生批判物四（一），这些同志不知道，他们反对的绝不只是物四（一），而是广大北大师生，因为我们的观点相同。

8月11日

昨晚去地院和清华，两校的斗争都很激烈，特别是地院更是厉害，在斗争中“东方红”等少数成了多数，各系、各年级纷纷倒戈起义，院原文革委员会看来大势已去。

今天概率论教研室的同志，贴出了他们在八机部抄来的大字报，揭发了流沙与范，张洁清，陆平的关系，及流沙参与破坏北大社教运动的事实。显然这些大字报的矛头也是针对吕正操的。

北大的运动涉及面极广，牵涉到前北京市委，中宣部，高教部，铁道部，八机部与国家科委，乃至河北省委，团中央等机关。因为有二批工作组，六七百名干部，几十名高干在北大复杂的斗争中表现了自己。

8月12日

这几天来北大参观的人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平均每天五万以上，今天完全可能达到十万人。昨晚一食堂，二食堂，三食堂、六食堂，员工食堂，全部住满了人。不算在同学宿舍过夜的，在筹委会登记的就有二千来人，而实际过夜的可能达到五千人。这些人大都是天津、保定等外地大中学生及远郊中学生。

这几天京津公路上，自行车，汽车来往不绝，天津大专学校，中等学校学生，老师大量的涌入北大，听说河北农大、三千余人，一夜功夫就走了一半，全到北大来了。

8月10日晚7：15，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首都革命群众，向全国革命群众发出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遇到了重重的阻力，各式各样党内外的牛鬼蛇神感到末日已经来临，他们是不会自行下台的，他们要进行背水一战。但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大革命势如破竹，是绝对不能抗拒的。

今天上午北大二万余师生载歌载舞迎接毛主席著作，在大饭厅举行了隆重的集会，各系也开了欢迎会。文化部代部长肖望东，石西民，李琦来北大讲了话，讲话后北京电视台新影都来拍了片。北京这次共印了十万卷毛选，市委就给我们运来了一万四千卷，这是对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支持。北大被全国来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在北大，我们北大学生成了少数，几乎整天都看不了大字报。以至冯思慎建议北大同学白天睡觉，晚上看大字报，让外地同学睡觉。北大的确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今天贴了很多团中央的大字报，要求改组。许多外校、外地同学揭发了一些阴谋，一些学校的领导人，工作组当他们被革命群众揭露责问，感到日子快混不下去的时候，就灵机一动，把学生一概放到北大了，这样一来学生兴高采烈，而他们也得以脱身。

收到了洪得炜的来信。

8月13日

下午5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广播后全校立即成了欢乐的海洋，北大和天津各院校的同学在校园里组织了联合大游行。日夜下雨，本来能露天过宿的同学现在都不行了，所有的食堂和教室都住满了人；同学宿舍也住人，我们宿舍加进四人。听说有一个女同学宿舍住了18人。早上去吃饭，或晚上吃饭，食堂已经是苇席满地了，许多中学生横七竖八的躺在那里，这种盛况真是空前绝后！

8月14日

在北大住宿的天津同学在2万人左右。今天至下午6点为止，来北大参观人数已至13万，天津同学达1万人。听说中央市委派了四个人来北大研究这个问题，听说还有几千名同学在京津公路上步行，预计在明天到达，中央已经派车去接。

今天贴了很多河北省委与天津市委的大字报，质问天津市委，居心何在？纷纷指出这是一个大阴谋，天津市委、河北省委的日子混不下去了，因此企图以放行群众，组织反扑，想冲垮北京的文化大革命。

胡乔木已经指出，流传的“柯庆施”的遗嘱是伪造的，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不写自传的，只有个人主义者才写自传。算我倒霉，抄炒了哪一个浑蛋编写的胡言乱语。在天津保定等市大中学生冲击下，我校运动简直无法进行，整天忙于接待。市委决定，15，16日两天北京大学停止接待。

8月16日

昨晚八点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斗争黑帮分子陆平彭佩云大会隆重召开，大会在工人体育场举行，首都天津保定各大中学校代表，中央各部机关，总参，总政，解放军院校代表，工农兵代表八万多人列席了大会。大会还附设了四个分会场，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李雪峰，王任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大会一直开到清晨一点半才结束。我们四点才回到北大，一夜磅礴大雨把我浇得全身都湿透了。雨季给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麻烦，刚出的大字报被大雨冲掉，大会，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常常被迫在雨中进行。昨夜大会一结束，北京市委就送走了参加大会的2万天津学生，可今天我校天津学生好像依然这么多！

今天上午十点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外地来的同志十万人参加，北京大学近两千名同学作为纠察队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始进行得较好，江青主持会议，陈伯达，李雪峰，姚文元，康生讲了话。后来少奇，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林彪同志来了，秩序很乱，挤得厉害，眼看要出大事了。林彪同志在话筒前面站了好一会儿，也没讲，后来江青同志当机立断宣布散会，听说少奇同志还没有下车就驱车回去了。

天津不但大学生来，中学生来，小学生也来了不少。

陈伯达同志说：我们要顶天立地，经得起一切挫折，一切困难，一切磨练，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休息以后的大会开得十分乱，林彪同志在话筒前讲了十三次“同志们，静一静”还是讲不下来。总理亲自走出主席台让包围主席台的同学（从四面八方，甚至从主席台顶盖上面）回去，冒着大雨淋了好一会儿，可没人听。因此江青只好说：“同学们，散会了，我们走了！”

今天上午的会是北京市委与北京大学主办的。两次大会，一些天津同学无理取闹，乱挤一通，挤伤了很多。特别是今天上午的会议，气得北大附中红旗战士（全部穿的军装）大骂混蛋。

因为天津学生的冲击，北京秩序显得很乱。

8月18日

上午首都群众和各地来的师生百万人集会欢呼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我们昨天几乎整夜未睡，晚11点吃饭，可今天赶到天安门时已经迟了，4点多了。北大队伍经尽了曲折，才到达天安门前。东方红，太阳升，早晨的天安门广场特别壮丽，正在一轮红日喷薄欲出的时候。清

晨五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与周围的群众亲切握手谈话，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欢呼雀跃的群众挥手致意。我们伟大的领袖今天身穿军装，显得更加意气风发，豪情盖天地。

然后主席接见了各地大中学校的代表。7点半大会正式开始，陈伯达主持会议，林彪，周恩来总理讲话，聂元梓，彭小蒙和哈尔滨，南京，长沙的中学生代表发了言。大会8点就结束，开始游行。

除了前面四行解放军外，我们的位置可能是最好的了。这一次我看毛主席看得最清楚，实在太好了！毛主席行动还很干净利落，身体很健壮。大会秩序却可能是首都百万人大会中最乱的一次，北大来晚了有责任，外地一些同学没开过百万人大会，不守纪律到处乱撞，也有责任。昨晚，到西语系，收集了一些有关常溪萍的材料，连夜写信寄往于静蕾处。我是昨天收到于静蕾来信的。

晚上看到物理系的一张大字报“为黑帮争取发言权”受到启发，写出了一张大字报“给黑帮以发言权”。当时遭到本班的许多人反对，但我还是贴出去了，且看后果如何。

给黑帮以发言权

（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二）“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彻底的革命者应该自觉地树立对立面，充分揭露矛盾，促成矛盾向革命的方向转化。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需要正面教员，而且需要反面教员，没有反面教员，中国人民的觉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四）黑帮分子要发言，要做反面教员是必然的，是事物本来的辩证法。我们可以给他们发言权，让他们充分曝露自己，让黑帮分子给我们作一个高质量的反面教员。

（五）革命师生要打“活老虎”。革命人民不畏惧斗争，更不是害怕说理斗争。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必须而且应该轰轰烈烈蓬蓬勃勃地前进。

（六）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1966年8月18日

8月20日

18日晚法律系的几个同学贴出大字报“揭穿周效亮、谢定国等人的大阴谋”，其余反对的大字报也很多，不过一概点的是周效亮的名。第二天就开始出现支持的大字报了，累计约有七八张，但双方都干劲不足，因此争论也就不了了之了。这几天北大又是一片危机之声了，许多人在叫嚷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处在危机之中。运动又是停止不前。许多人热衷于给筹委会提意见，革命者面前真是有火海刀山，困难重重啊！但有伟大统帅毛主席领路，我们一定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8月22日

历史上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群众的大发动，都伴随着大破坏，革命时期就是千百万群众大表演的时期，就是无数无名氏蜂拥而起，在政治舞台上奇峰突起的时期，也是无数反动派，保守派、政治庸人、凡夫俗子被淘汰被取而代之的时期。目前我们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动，大革命时期。一切革命者，一切真正懂得历史的明智之士都应该欢呼这场大革命。反对这场革命，害怕这场革命就是历史的庸人，就是资产阶级的凡夫俗子。著名的剧本《带枪的人》描写过这样的场景，红军战士，武装的工农赤卫队攻占了一所极端豪华奢侈的官僚大地主庄园，他们在里面住，在里面吃，用最珍贵最稀罕的古董瓷器器皿当小便器，把资产阶级的老爷气得像发疯一样。让他们去暴跳如雷吧！资产阶级的一切看来仿佛是不可亵渎的圣物，在无产者看来一概都是盛粪便的东西。

这场大革命是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只有毛泽东这样天才的革命家才能领导这次革命。我

叹服这次革命，我希望能成为历史上无名的革命小将，我急切于成为一个在革命中大显身手的人，我有能力、有智慧、有意志这样做。但我现在却不能大胆行动，我可耻的出身注定我只能甘于现状。我有没有勇气与家庭断绝关系呢？这样做好不好呢？写大字报，斟字酌句，唯恐给人揪住辫子，有些“敢”的风格吗？

我们最敬爱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这样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势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

如今这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刻到来了！

如今这个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到来了！

如今这个光荣伟大的重担落在我们无产阶级后代的身上了。

在同学间流传着一首主席诗词

卜算子（永梅） 悼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艾地

疏枝立寒秋，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天反凋残。

残因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8月23日

上午北大红卫兵召开了成立大会。

这几天我急于赴上海串联，但苦于没人支持，开不到证明，一个人行动毕竟是不可能的。至于有人骂资产阶级狗崽子，我到是不怕的，我原谅他们，干革命把命豁出去都不怕，还怕人骂！“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一世不干革命，那将是何等乏味啊！

革命的青少年说得好，人生一世就要被人拥护或者被人反对，就要有革命棱角，革命锋芒，要不就是窝囊废！

我想写一份：“叛逆者宣言”彻底甩掉家庭这个沉重的包袱，可是又耽心效果不大。

8月25日

“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太好了！这是篇与“让青春放出光芒”的文章针锋相对的对立面。两文都赞扬了青少年，都赞扬了青春，但却是两篇观点大相径庭的大文章。

应该把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当作最重要的文章来学习。

彪炳显赫的革命雄文

笔力雄健，横扫千军威尚猛

文锋犀利，刺破青天锷未残

革命的小将吼声震天：要革命，要造反！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文化革命的暴风雨，来势凶猛，如泰山盖顶，如怒涛汹涌，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从古以来，敢于闹革命，敢于创新的，大都是“幼稚”的年轻人。他们一抓到真理，就藐视老古董，向老古董宣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但是胜利的总是那些原来名不见“经传”的青年。

革命的辩证法是无情的，那些代表旧势力的人物，看起来似乎是庞然大物，不可一世。但是他们逃脱不了革命辩证法的惩罚。那些代表新生力量的小人物，不管在斗争中将遭受怎样的艰难曲折，遇到多么大的阻力，他们最后必将战胜旧势力。他们是敢于“冲决罗网”的“狂飙”式人物，而不是小心翼翼生怕革命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政治庸人。他们是敢于在革命大风暴中搏击长空的雄鹰，而不是卷缩在屋檐底下的家雀。

8月26日

进城在文联大楼观看了文联的大字报，文联的所有领导人几乎一概被斗了。我觉得很烦闷，耽不下去了，想离开北京。

8月27日

晨，关仁义来京，晚于静蕾及其同学张明芳来校。

8月28日

白天上午与于静蕾，张慧芳，关仁义三人游颐和园，下午去俞颖处。

关仁义还是那付不可救药的狂妄劲、无知与骄傲。于静蕾依然故我，倒是张明芳这个同志显得很有趣。俞颖的话很多，滔滔不绝，看来是一个活动份子。

梁斌的红旗谱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春兰穿着锈有“革命”两字的上褂，落落大方的走上了锁井镇，锁井镇上人山人海，前拥后挤争看“革命”，他们叫嚷着看革命啊！看革命啊！锁井镇上这段轶事预示着伟大的农名革命运动风暴。

俱往昔！而今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学生，胸前挂着毛主席语录，书包上也锈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他们集体朗读主席的教导，这派兴旺景象不真是一次政治、经济、文化深刻得无与伦比的大革命的预兆吗？

8月30日

上午我们战斗小组，讨论写了张大字报“新北大的革命同志努力啊！”

下午去工人体育馆看1966年北京国际乒乓邀请赛半决赛，中国对朝鲜。这是第一次但也将是最后一次看比赛，路太远了，很不方便，以后不准备去看了。晚上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五四广场上灯光照得如同白昼，电影厂的六，七架探照灯来回扫视，主席台上闪光灯不断，五六个记者拼命在那里抢镜头，王任重同志出席了大会，北京市文革主任吴德、副主任陶鲁笏因有会不能来参加，也派了代表来。大会开得很隆重。我估计明天的《人民日报》会大肆宣传的。

8月31日

东语系 乔兼武（乔俊礼），杜文革（杜文中）写出了一张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造三个大反”。公然叫嚷“取缔党团组织，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叫嚷党政合一，叫嚣要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当即反驳的大字报贴满了，晚上10点召开全校批判斗争大会，批驳了乔俊礼的反动言行。

大会主流是好的，但是极不民主，压制不同意见，围攻恐吓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学，简单地把乔打成敌人，是十分不慎重的。

因为群众的抗议，大会的调子越唱越低，从初始要乔俊礼低头，到要他坐下，以至还给了他一件衣服穿，显然筹委会对这次会议没有充分研究。

东语系一红卫兵认为乔的大字报是反动的，乔本人不一定是反动的，当即遭围攻，许多人呵斥他，大会的一些主持人还要撕他的红袖章，他当即表示抗议，退出会场。

我看到这里感到很气馁，也说了一句“我也退出会场”离开了我的同学。始后一想，大会主流是好的，批判斗争是及时的，应该的，我又回来了。我觉得刚才的行动，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加以充分的考虑，是错误的，危险的。这反映了我感情深处的东西，对反革命的东西熟视无睹，而对革命的缺点却敏感异常。今后碰到事情千万要冷静，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来分析。

9月2日

于静蕾这个人也不太好接近，不过很可能归根结底是我这个人不好接近，思想的城府如此深严以致令人望而生畏了。今天《光明日报》记者向他们约了一份稿，我没有了解情况，就对他们说：“你们总不给人方便！”这个指责显然没有道理，没有调查研究，她当时变了脸，愤慨地说：你老是给人扣帽子。他批评得很尖锐，我很尴尬。过后一想觉得有理，但一想到“老”字，不免有些悲伤。我难道与于静蕾接触了仅几天，就“老”给她扣一些帽子吗？我应该自责，我的谈吐可能太道貌岸然了，太狂妄了，革命的词、自诩的词太多的挂在口头上了。

入学以来，很多大学同学都有我这样“不好接近”的感觉。我也知道，我曾经希望摆脱这种状态，但是没办法。

我有时觉得很孤独。

我优柔寡断，迂腐，装腔作势，狂妄，好出风头，令人讨厌。我渐渐失去了我应有的质朴，热情，大方，开朗，该诅咒的陆平黑帮把我坑害得多么厉害啊！

于静蕾对我戒心很重，唯恐冒犯了我，这是我谈吐和言行应有的报应。

9月6日

我已经是在隆隆的津浦线列车上继续我的日记了。昨晚我克服了剧烈的动摇与鲍宏，关仁义一起来到了北京车站，在广场中露宿了一夜。今天四点便离开北京了。

关仁义的所作所为搞得我很尴尬，幸好他决定走了，要不会被赶走的。没有我的面子。他在124室一天都呆不住。但他终于招来了一张大字报“关仁义你究竟干什么来了？”

但是他极端无知，一会儿要我找作者辩论，一会儿要撕大字报，如此不识时务，真是世界上罕见。我声色俱厉地警告了他，他才收敛了一些。上海人有很多缺点，我与陈奎宁说：“现在，我觉得与上海人相处有些不习惯了。”陈曰：“我与说上海话的上海人相处感到不习惯。”

9月7日

上午9点到达了镇江，阴雨蒙蒙霏霏，因为想去扬州，不顾鲍宏与关仁义的阻拦，把心一横就下了车。

中午到了镇江农机校，与“东方红”战斗队的一些同志作了交谈，主要是向他们介绍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晚上与“赤卫队”的同志座谈了，向他们提了几点建议。几个“赤卫队”同志的观点也不完全一样。

北京农机，北航一些同学指责赤卫队是保皇派，大方向有问题，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可能赤卫队的观点比较保守一些，革命闯劲还不够，但他们很注意政策，况且他们的观点也是在改变，也是在进步的。他们是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大方向也是基本上对的。“东方红”不应翻他们的老账。

“东方红”的观点比较先进，人也多，不过他们对赤卫队有些专横跋扈，傲气太重，大多数人还认为“赤卫队”是保皇派，显然这不利于团结。台风、暴雨、整整逞了一天的威，去扬州的轮渡不开，我就只好住在农机校了。

9月8日

台风警报解除了，但风依然很大。我看了《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因此认为杭州还是不去的好，去了我一个人也是无用。

上午开到了免费乘车单，是晚上6：49的，因此乘空闲在镇江城走了走，去了金山，在甘露寺认识了镇江造船机械厂的两位工人，与他们交了朋友。他们给我照了相，我们三人还合照了一张相。

金山寺顶上的御笔石碑“江天一栏”，甘露寺的石碑“天下第一江山”都给砸了，其他一些石碑石牌也给砸了不少。这些东西为什么要留下呢？可格砸勿论。

下午去镇江地委看了看，又随便走进镇江师范学校，本来想看一看马上就出来，但想不到一进去就出不来了，被他们围住了。

镇江师范学校的同学老师对我一个普通的北大同学有着难以相信的热情。他们听说有一个北大的同学来了，蜂拥而至，一下子就聚集了快一百个人（他们全校师生不到400人）。我给他们介绍了北大，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的口才不好，讲得不流利，不怎么生动，可还是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特别是当我讲到毛主席派中央首长来我校的情况时，他们兴奋地鼓掌。我讲完后，他们就要求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真是对我信任极了。当他们知道我6点就要离开镇江时，他们极力挽留我。当我答应今晚不走明天走时，他们又是一阵欢呼雀跃。左右前后

有人陪我看大字报，真使我浑身难受惴惴不安。

晚上我又在教工俱乐部与革命师生举行了座谈，有200多人参加，气氛十分热烈。我两次介绍了北京，北大的情况。接着他们又递纸条要求我回答问题，我大约收到了近100张纸条，他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提出来了。

我一方面立场鲜明坚决表态支持革命左派，同时也很谨慎不贸然回答他们有人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防止犯错误，给坏人利用，为镇师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不好的影响。他们越是热烈的欢迎我，信赖我，我一定要更加谦虚谨慎，当群众的小学生，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学习。

如果像北航王长才一样，动辄就是抗议，就是阴谋，对广大革命群众不是循循诱导，而是发号施令，不是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而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群众，群众就不会吃你那一套，好心就会起坏作用。

事后向一部分同学了解，他们认为通过介绍北京的情况来煽风点火，群众就不觉突然不觉接受不了，效果比较好。当晚就有同学准备成立战斗组，不接受文革小组的错误领导。晚上我讲完后，他们拼命鼓掌表示感谢。我涨红了脸，连连摇手。我当然有愧，我有什么权利能够接受这么多掌声呢？！光荣一切属于党和毛主席。

我受到了多么大的教育啊！外地无数革命师生，是多么想望北京，想望毛主席啊！他们早也想，晚也想，梦中想，就想着有一天能上北京，能见到毛主席。而我作为一个北京的大学生，长住在北京，却身在福中不知福，对这点意义了解得很少。我在毛主席身边学习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应该时时刻刻想着这一点，用它来鞭策自己，我应该无愧于作一个万众瞩目的北京的大学生。镇师语文组的同志在下午与同学座谈时给了我一个条子，把它记录下来，让我永远记住吧！其他很多条子，全留在镇师了，我手上只是偶尔带走了一个。

北大同志：

我们最最热流的欢迎您到我校来进行串联，我们已经等了您好几个小时了，我们最真挚、最迫切的欢迎您跟我们谈谈，我们最殷切地要听听来自毛主席身边的战士的声音。敬爱的同志，我们欢迎您，我们等待您。

此致

革命的敬礼

镇师语文组革命同志

9月8日

9月9日

上午8点33分离开镇江去上海

下午3点多到达故乡上海。

8月30、8月31、9月4日部分北京红卫兵与少数上海学生，大闹上海市欢迎外地革命师生大会，两次冲进市委大楼，责问上海市委，搞得上海满城风雨。听说，5日6日两天只要听你说普通话，马上就有人围住你要辩论。的确上海人民是十分热爱上海市委的，我在感情上也是一样，上海市的老工人、先进工人讲了许多肺腑之言，（贴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大字报。这些老工人看到、听到这些不好的事件，个个老泪纵横。要不是他们听党的话，文斗不武斗，早把这些小家伙打了。梁仁达烈士的夫人。杨富珍等革命工人的讲话，我看了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北京红卫兵必须尊重上海人民，必须尊重上海百万产业大军，如果再专横跋扈强加于人，必将脱离上海一千万人民。

下午去华师大，找到了乐俊国。晚9点多回家，正好红卫兵在抄“老板娘”的家。

9月10日

上午在华纺，中午在市委，下午、晚在上海外语学院。

9月11日

上午决定与生物系几个同学一起离开上海去南昌。南昌在危急中、南昌在恐怖中，它请求全国革命师生的支援。下午4：50离沪。

9月12日

上午9：07到达英雄的城市南昌。

下午付省长黄知真讲话后，晚上又是空前的游行。几十辆宣传彩车在街上来回开，妄想造成虚假的和平、欢乐、庆祝的空气，掩盖前几天省委挑动工人斗学生的严重事态。

南昌满城皆是大字报，大标语，大口号，南昌的学生狂热地呼喊“炮轰司令部，火烧省市委”洪都机械厂工人等也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这一口号，一般工农目前表示沉默，只是表示支持省委黄知真讲话。我看江西省委有鬼。

9月13日

黄知真讲话后，大专学生又是一片反对声。“黄知真揪定了”，“等着吧！黄知真等我们从北京回来后算总账”，“黄知真，我们把你镇压学生运动的功绩上北京去向党中央报告”。市内工人，干部，农民开始支持学生。而一些支持黄知真讲话的游行队伍尽管声势浩大、色彩缤纷，持续不断、却没有战斗力量。

我看黄知真再不真真检讨就危险了。上午参观了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八一纪念馆。南昌不愧为英雄城，江西不愧是真正老革命根据地，这块土地上遍地都洒满了烈士的鲜血。

纪念馆收集了全省20多万烈士的名册，祭堂正有主席献的花圈，“邵式平同志千古，毛泽东敬勉挽”。

我觉得我该写封信给上海市委，建议上海市委也做好革命文物，纪念地点等的工作。上海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

外地的高校师生几乎都跑完了，或去首都，或去全国，江西大学只有40余同学。再说我个人行动困难，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出身不好，人家不欢迎。看来还是回校革命比较好！想与其它北大同学合伙搞革命，他们知道我的出身后也退却了。我不想去使他们为难，晚10时乘车离开南昌去长沙。

9月14日

上午到达长沙，步行去湖南大学，在湘江边上休息了一会，一时兴起，到湘水中游了五分钟泳，“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能够在毛主席游泳过的地方游泳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湖南大学就在岳麓山上，学校没有校门，任人进出，故岳麓山公园与湖大就混为一体了。

湖大目前主要是在揭省市委的问题，有些人对王延春（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问题揪住不放，对张平化也咄咄逼人，这不是正确的态度。

傍晚登岳麓山顶，对联“古松拔地五千年，长翼垂地八万尺”把岳麓山苍松翠柏树木扶疏及山鹰盘旋，冲击长空的廖廓雄伟的景象贴切地描写出来了。山上埋葬了几十位旧民主革命的烈士如黄兴，蔡锷等。张辉耀的墓也在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毁了。

湖大礼堂的背后不远就是著名的“爱晚亭”，回忆起主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我无限惭愧，我难道只能做政治的庸人吗？

晚上抄了谢富治副总理的一封家书，非常好！

9月15日

离开长沙去武汉，车太挤了在武汉停了一天，一方面看看，一方面休息一下。

下午三点到达武汉，傍晚参观了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武汉水利水力学院。在武汉的二千名外地师生，主要是北京师生，建立了南下北上串联总部，其观点明显和武汉的师生，工农观点不一样。一个要打倒张体学，一个说张体学跟毛主席跟得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北京的师生在武汉显得不受欢迎。

9月16日

中午离开武汉前，参观了驰名的武汉长江大桥。我望着这滚滚长江，我是多么想跳下去搏风击浪呵！可是我害怕风浪，我十分鄙视，厌恶肖涧秋之类的人物，但我自己却是一个十足的肖涧秋，可悲极了！

9月17日

中午回到北大，年级里正在开展小整风。大家对我这次出外串联显得有些不满。收到了魏兴全给我的来信。

9月19日

文化大革命深深的触及了我的灵魂，我的思想紊乱不安，在剧烈动荡中。我得到了这种时刻不在这场风暴中死亡，就在这场风暴中得到新生。尽管我目前包袱重重，个人患得患失，与红卫兵革命小将有天壤之别，但我不甘“死亡”，我将永远战斗，永远革命，我是死也不甘沦为政治庸人的。

这几天时间安排的极紧，想去看看来京的上海同学都没有空。

这几天一些同学对我的这次出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尖锐的责问。我过去是陆平时期的红人，只听甜言蜜语，只听好话，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真正的批评。现在有人批评我了，好得很，我应该高兴。

我这次出走曾经历了十几天剧烈的斗争的。我犹豫、动摇，一天之内经历几次反复。

我想走，我觉得北大目前平淡无奇没有斗争，没有事可干。每天读毛选，读马恩列斯吧！我坐不下去，我觉得这样干有愧于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若干年后，当有人向我，在那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在文化革命的一个中心北大，你干了些什么？我难道能说：我在图书馆里读完了恩格斯的…，马克思的…。这一切难道不酷似于三十年代的吴晗吗？在图书馆中躲过了轰轰烈烈的斗争风暴。但是我又不敢走，班里的同学都没有决心走，我一个人走呢？太不方便了，自己出身不好，能走得出去吗？班里会同意吗？我走后，同学将会如此反应呢？“怕”字重重，笼罩了我的头脑。但是我实在不甘沉默，不敢死亡，不甘做政治庸人。我想既然我有资格参加四清，那我也一样有权出去串连，至于黑七类子弟禁止外出的说法，不一定要遵守。至于有人反对，非议，那是肯定的。但外出串连的人，哪一个不是顶着风走的呢？我应该迎接斗争的风暴，不能躲在蜗牛壳里，我毅然决然地走了！尽管在火车上我还是忐忑不安，但我终于离开了北京。

现在看来这一切的考虑，都是以个人出发的，我的确没有想到北大的运动会怎样，选举会不会垮台，如果垮台影响又将如何？这一切我却一概没有考虑，我没有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

9月20日

化学系请到了门头沟煤矿老工人，白宝纯做忆苦思甜报告，尽管他的报告我听过一遍，但这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听，觉得教育特别深。在旧社会里白大爷受尽了各种各样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摧残，因此他对牛鬼蛇神最恨，恨得咬牙切齿。当他讲到在北大文革展览会上，看到一些臭知识分子还藏着日本旗、美国旗时，他愤怒到了极点，他恨不得把这些牛鬼蛇神砸个稀巴烂。可我呢？当我看到这些时，有强烈的反响和愤怒没有？没有，我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

今天晚上的斗争大会，主要揭发了陆平打击迫害工农同学，包庇反动学生和坏人的罪恶事实。我对党的阶级路线是拥护的，但是不是毫无保留，真心实意的拥护呢？特别是对红五类子弟采取的一些行动和言论是否真正的予以支持呢？

我往往没有看主流，总觉得有些同学有些偏颇了！

下午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希尔主席及夫人来我校参观访问，赵毅敏陪同，受到了我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9月21日

在上午的班级整风会议上，武礼津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就出外串联，没有清除西方文学的影响，以不好的方式搞了两本书，谈话时马列主义、辩证法一套套的等事项提出了意见。晚上系里开了斗争陆元杓，程民德大会，较好。

中午张继阳来我处。

9月22日

晚上又召开了斗争黑帮分子 陆平、彭佩云大会，在会上各系革命师生员工愤怒的控诉了陆平、彭佩云黑帮集团，打击迫害工农学生，调干学生、革命左派、包庇坏人的滔天罪恶，大会开得十分成功。会场革命师生，始终处在极端愤怒中。台上的几个黑帮分子吓得瑟瑟发抖，群众的感情，群众的愤怒，群众的意志是多么伟大的力量啊！会开完后，同学高兴地说，这样斗下去，准能把陆平黑帮斗跨。因为群众烈火一样的愤怒，大会斗争时让杀人犯孙宗鲁跪了一会儿。在群众的愤怒狂飙前，把陆平、彭佩云黑帮吓得垂着手低着头，弯着腰，一个大气都不敢出。在大会进行时，我也怒不可遏，每一句口号都出自心间，打倒陆平黑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9月23日

今天班里继续整风，我也发了言。

我觉得入北大四年来，自己好像思想改造、思想斗争也抓得很紧，但基本上回避了主要的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主要矛盾。而对彭真、陆平、那一套很感兴趣，譬如反对中游思想，反对“三过”[2]，自己的确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的结果往往不是无产阶级化、革命化，反而修正主义的观点更加牢固了。

这次出外串联实质上也是以这条线为纲的。武格钦发言，说他过去很羡慕我，以我为榜样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看来我确实是当了一回修正主义的黑榜样，不仅在学习方面，而且在政治上。

晚上在北大周围试放焰火，今年的焰火有很多瑰丽无比的新品种。

同学张继阳来访。

9月26日

晚上庄家富同志来我校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

胡平及其同学来访。

9月28日

志华来看我，他是27日出去串连回来的。

在35天内他跑了西安、成都、重庆、贵阳、桂林、广州、长沙、武汉、上海、杭州、济南11个城市，经了大世面，见了大风雨，收获很大。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嗟呼哀哉！

9月29日

中秋节，竟然没有一些过节气氛，很自然。

9月30日

国庆前夕，首都一片节日气氛。

下午我去昆明湖游泳再次横渡，创游泳最迟日期记录。而最早日期的记录是去年5月14日。

（未完待续）

~~~~~

## 【劫后反思】

### 宋彬彬道歉之后

· 启 之 ·

#### 五种声音，一个背景

宋彬彬的道歉及女附中团队的集体发声，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群情汹汹，议论蜂起，唇枪舌剑，派别林立。发生在48年前的“八五事件”，演变成了今天的公共话题。南方周末评论员把不同的派别，分成击节者、嫌弃者、嘲讽者三种，这个分法概括不全面，表述不明确。在我看来，不同的观点至少包括五种：1、赞成，2、反对，3、谴责，4、还不够，5、借题发挥。下面详析之。

#### 1、赞成派。这一派大致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女附中的老师和宋的校友。他们肯定宋彬彬的道歉，认为，宋劝阻了打人者，抢救了卞校长，不应该追究她。四十多年来，她替别人背黑锅，生活在阴影之中是不公正的。如女附中原校长王本中在1月12日的师生见面会上谈到，对于“八五事件”，“宋彬彬承担了一些其实不该承担的责任”。她“本人很坎坷很苦恼，希望她可以解脱，但是永远解脱不了，你把事实讲了以后也解决不了的，因为宋要武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符号了。”但是，这种声音很小，外界鲜有所闻。

第二种人是社会人士。他们或着眼于道德意义——宋的道歉有益于国民反省。宋之一小步，中国一大步。或着眼于效果——宋打破了信息封锁，将文革放在聚光灯下，使罪魁祸首无处遁形。或着眼于转型正义——文革中的作恶者无计其数，而道歉者凤毛麟角。苛责道歉人，本身就可能不公。或着眼于法理——指责宋假道歉真辩解没有道理。道歉者有权自辩。

第三种人是文革研究者。他们了解事实真相，知道历史的复杂性。针对社会上流传的“老红卫兵乘机翻案”“红二代占领道德高地”的说法，他们指出，这次“道歉—反思”活动的参加者，并非都是老红卫兵和红二代。其中有不少是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者。针对实验中学把宋被选为“知名校友”，并以宋给毛戴袖章为荣的指责。他们指出，宋在校庆活动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以宋给毛戴袖章一事为荣的是校方。此事正说明学校负责人对文革的无知。

针对舆论指责刘、宋隐瞒真相的说法，他们指出，刘进、宋彬彬作为“八五事件”的当事人，只有澄清相关事实的责任，没有调查并公布全部真相的资格和能力。

针对有人怀疑宋的动机，指责她辩解的说法，他们指出：“揣测动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道歉时可以做出说明和辩解，因为我们的一切评论和判断都必须基于事实。宋彬彬尤其有权利、有必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说明，还原历史真相。“任何一个道歉人都拥有为自己辩护，道歉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澄清事实的权利，自辩本身就属于追究真相的一部分。……道歉者的自辩不仅是权利，在诸多不实指控中，甚至还是澄清事实真相的义务。”

#### 2、反对派。这一派大致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是某些当年的老红卫兵。几个月前，他们化名出现在北京八中校友网，大骂陈小鲁。现在，他们又骂宋彬彬，并以各种方式向她施压。

第二种人是“毛左”。在他们看来，文革是好的，毛泽东是对的。今天的贫富差距和腐败成风，证明了“走资派还在走”！道歉会误导年轻人，把刘邓和红卫兵的错，栽到毛的头上。

第三种人来自社会人士。他们认为，现在的大方向是肃贪反腐，宋的道歉转移了大方向，干扰了中央部署。

3、谴责派。这一派包括各种人：激进人士、“公共知识分子”、愤青、政治上的左、右翼、文革中的造反派、民族主义者，等等。谴责派的理由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六：

（1）阴谋说：说法之一：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都是国家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旨在舍卒保帅——把文革首恶的罪行转嫁到革命小将身上去。说法之二：宋彬彬为了掩盖罪行，由与王家相熟的叶维丽出面，骗取王晶老的信任，以帮助他整理材料为名，派遣于羚潜伏王家，长期卧底，“掌握了王晶垚的全部资料之后，他们便开始有计划地篡改有关卞仲耘之死的历史事实。”

（2）作秀说：宋的道歉是一场道德秀。

（3）辩解说：宋是假道歉，真辩解。

（4）掩盖说：宋的道歉掩盖了“八五事件”的真相。

（5）包庇说：宋的道歉包庇了打人凶手。

（6）否认说：宋的道歉是“文革虐杀否认派”的大暴露。他们否认的，“就是文革中红卫兵大规模、群体性虐杀的事实真相。”

在这六种说法中，“阴谋说”最搞笑。与其说它是在谈文革历史，不如说它在搞文学创作。“作秀说”最经不住推敲。宋之道歉引来了亲友的埋怨，“毛左”的咒骂，上下左右的谴责。与其说她作秀，不如说她自找苦吃。“辩解说”不无道理。宋的道歉确实有辩解的成分。问题是，她有没有辩解的权利？她的辩解对揭示真相有没有好处？“否认说”最不讲理。它罔顾事实，横扫一切。在它的笔下，不但叶维丽、印红标、卞伟华、徐友渔等文革研究者成了“否认派”，而且把卡玛（Carma Hinton）和冯翔（南方周末的记者）也归入其中。甚至卡玛的父亲韩丁、母亲史克也受到了株连。“否认说”对文革大批判的复归，引起了众多的反感，以致连一直为王友琴说话的胡平，都认为“用‘否认派’这种称呼未免简单化”，并且批评力主此说的亦虹“信口开河”。

在这六种说法中，“掩盖说”最复杂最细微，也最让局外人难以判断。它指的是“八五”前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殴打卞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宋是否参加了红卫兵？宋是不是揪斗校领导的组织者？是否劝阻过打人的学生？是否将卞校长送到医进行抢救？是否改名“宋要武”等具体史实？

比如，有人怀疑，宋彬彬是否劝阻过打人者。有人则认为宋彬彬当时说了“杀杀她们的威风也好”一类的话。而更多的女附中师生则证明宋彬彬确实进行了劝阻，并没有听到过她说这句话。

再如，王友琴认为，毛接见宋彬彬之后，宋改名为“宋要武”。而宋彬彬和她的同学则证明，



她从来没有改过这样的名字。王友琴又以给医院作担保的7人名单为证，说“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其实，这个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女附中的老师李松文，宋的名字写在最后。更重要的是，她不是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在这一公共事件发生之前，在不断披露的史料和考证详实的论著中，就已经得到了有力而明确的回答。但是，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们来说，“掩盖说”仍然很有迷惑力。

在这六种说法中，最有力的是“包庇说”。其代表性言论如：“你们称两次劝阻打人，可事到如今，你们却说不出一个打人者的姓名？你们是真的劝阻了吗？如果是真，你们就应该知道打人者，而你们不说，就是包庇。”还有一种质问，似乎更命中要害：“如果说，宋彬彬是高三的，不认识打卡的高一和初中的学生，那刘进调查了一百多人，难道还不知道打卡的凶手吗？”

刘、宋和女附中团队，在这些貌似一针见血的质问面前选择了集体沉默。

沉默的背后是无奈，是等待常识的复归——宋、刘当时是高三三班的学生，尽管她们当了学生干部，也不可能认识所有的学生。而打人的学生有高一的，有初二的，还有外校的。她们劝阻打人者，而说不出打人者的姓名，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刘进虽然调查了一百多人，但她的调查是私人行为，在没有被调查者授权的情况下，她无权公布调查结果。而在被调查者中，有人已经去世，没法授权。指责宋彬彬没有控诉极权首恶的说法，也有脱离实际之嫌——指责者似乎忘记了中国人是在什么语境下生存，忘记了大陆媒体的现实处境。

在谴责派中，激进者是主力，“公知”是先锋。激进者将宋彬彬视为“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公知”把宋彬彬归为替“老兵”翻案，为“红二代”张目。激进者多在海外，占据自由言说之利，其言论对国内影响甚巨。“公知”多在国内，其标榜自由主义，怀抱宪政理念，追随者众。这内外两种力量相加，使谴责派在诸派之中，处于压倒之势。

4、“还不够派”。在赞成与谴责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界限不甚分明的中间地带。很多人在这个地带留连。留连的原因有多种，有人是出于“政治正确”，有人是出于中庸之道，有人是出于有保留的同情。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是，宋的道歉和女附中团队的调查，值得肯定。但是，她们做得还不够。不够的理由很多：因为她是学校的负责人，因为“她任副主席的学代会参与的对卞的批判，埋下了卞仲耘之死的伏笔。”因为她是给毛戴了红卫兵的袖章，把毛尊为红司令，红卫兵的暴力从此更加势不可挡。因为她的名字引来了“要武”的最高指示，而“要武”对武斗和暴力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宋彬彬在道歉中并没有承认这一责任。”因为“调查组在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余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这一派遵循的是“疑罪从有”，而不是“疑罪从无。”

5、“借题发挥派”大体上可分两种人，一种人是朝人去，另一种人朝体制去。其共同点是对“八五事件”没多大兴趣，而是以此为引子，或指桑骂槐，或由此及彼。有人奉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以及“文革中的干将们、打手们、屠夫们，刀笔手们及早道歉是出路。”有人借王晶老之口散布这样那样的不实信息。另外一些人则以介绍新思想新理念新学说为职志，向体制、向首恶、向十七年教育开火。他们谈论“国家道歉”、“平庸之恶”、“转型正义”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借“他山之玉”——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剖析，南非等国家在社会转型经验，来说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以上五派，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新材料的公布，新观点的传播，诸派会分化。有的赞成派，因为王晶老的声明，转向了谴责。有的“还不够派”和谴责派则因为南周系列文章发表，变成了赞成派。我认识一位历史学者，刚开始，他对宋彬彬等进行指摘：“作为当事人，仅

仅以‘没有劝阻’就脱得了干系了吗？你当时压根就没想过劝阻嘛！甚至还跟着起哄了，还动手了是不是？即使是没直接打卞校长，是不是打过别人、骂过别人？……（女附中道歉者）以求得卞校长丈夫的原谅为终极目的，本身就说明了她们不想成为那个罪行的当事人，没有勇气把自己划为那个时代的‘有罪之人’。这样的道歉与其说是求得死者家属的原谅，不如说是求得自身的解脱。”三天后，他改变了看法：“她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忏悔因子，毛左们极力反对甚至威胁的背景下。她们可以说是拓荒者。”

与此同时，反对派的阵营也在缩小——随着同情、赞成、正面评价的增多，某些社会人士也放弃了原来的立场。谴责派的中坚人物，也在随机地调整自己的立场：王友琴开始承认宋彬彬的道歉“很好，至少是个进步”，“应该欢迎”。十天后，她又认为，宋是“红卫兵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这样的否认派的道歉是谈不上进步的。

文革纠缠改革，现实绑架历史。以上五派都来自如下背景——

一、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政策，造成了真相掩蔽，是非不清。文革的遗留问题无法得到公正的处理。一方面，清理“三种人”对造反派进行了彻底且严厉的整肃和清洗，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在“红八月”中负有重大责任者，非但没有得到清算，反而当官发财，占据要津。因为文革成了禁区，造成了大面积的思想混乱，有司以防民口为职志，执政以护圈腾来延年。下有毛左为浩劫评功摆好，上有薄氏假平等蛊惑人心。和谐时时高奏，维稳压倒维权。

二、改革以来，官权独大，吏治败坏，腐败之风蔓延到全社会。学术造假，教授剽窃，“犬儒化”、“两面性”深入学界。一批“红二代”承父荫，施特权，党政军集体接班，垄断政经资源。杨继绳在2011年发表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把中国社会分成五大阶层。第四个阶层是农民、工人、农民工，第五阶层是城乡贫困人口。杨的结论是：“我们当前的阶层特点就是，80%的经济活动人口在经济财富上处于社会中下，这是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高阶层的财富获得的不透明，所以社会对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同。”

这一背景使赞成派看到了女附中道歉—反思的启蒙意义。他们知道，一味地质疑宋彬彬的动机，一味地抓团队的小辫子，既不利于青年一代了解文革，也不利于民间反思，更不利于敦促官方改变现行政策。他们指出，“在官方压制文革反思背景下的中国，民间还有顽强破土的‘文革人’道歉焦虑，是件特别难得的事。……无论道歉的内容多么不尽如人意，都至少首先要珍视‘文革人’道歉这一现象，对道歉行为本身首先要肯定、鼓励和支持以及帮助。”他们看到，宋的道歉是“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象”“蕴含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对极权政治下普遍人性扭曲的深刻反省”。他们“希望民间的道歉活动，能够成为推动文革反思的一个契机。”

老红卫兵反对刘、宋道歉，是因为，一者他们对当年打人抄家心里有愧，二者他们担心事情闹大了，会扰乱他们平静安逸的晚年生活。至于“毛左”反对刘、宋发声，则是因为上有“保护首恶”的国策给他们撑腰，下有憎恨贪腐的民众给他们打气。

“事无两样人心别”。赞成派看重的是效果，是大节，是还原历史；谴责派看重的是动机，是细节，是群众情绪。赞成派从事实出发，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谴责派从印象、经验或理念出发，以政治诉求为目的。北大孔庆东直言：“那些红二代，飞扬跋扈，搞极左行为。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被平反，变为西化派，倒卖国家资产。今天又把他们的罪行推到文革头上，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因此，在同样的背景下，谴责派做出了与赞成派完全不同的选择——抓住了宋彬彬和女附

中团队，把她们当做“老兵”和“红二代”的全权代表，把宋的道歉视为“老兵”为“红八月”翻案，把女附中团队视为“红二代”占了政经便宜，还要占道德高地，企图改写文革历史的一小撮伪善者、阴谋家和作秀分子。他们想通过对宋、刘，对女附中团体的谴责，控诉文革暴力，揭发首恶罪责，批判现行政策，从而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

“还不够派”嫌宋彬彬的道歉——反思不够，很大程度是因为“现实绑架历史”——在文革之恶未得清算，某些红二代独占资源，某些官二代独享特权，社会心理仇富仇官的语境下，如果完全放开符号人物宋彬彬，他们在潜意识中会感到担心和害怕，担心舆论的指责，害怕偏离“政治正确”。因此，他们一定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批准宋彬彬的道歉，不放女附中团队过关。

“借题发挥派”中的两类人，动机大不同。朝体制去的是基于历史的混沌，政改的停滞，做的是启蒙事业。而朝人去的，多是文革中受到伤害者或现实中的失意者，他们有报仇雪恨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没有底线，不择手段。只要为了能够泄愤出气，即使胡编乱造也在所不惜。

上述五派，“谴责派”的声音最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谴责“达人”多在海外，他们据时空之便，占自由之利，说话著文百无忌惮。而赞成派在国内发声，不得不小心翼翼。比如，女附中的老师们说话最有分量，但是他们拒见媒体，除了身体原因外，主要是心有余悸。而女附中的大多数校友则不想趟这个浑水，尤其是看到气势汹汹的谴责之后。时空语境之不同，更使刘、宋和女附中团队特别小心翼翼，格外注意策略分寸，以便在有限且严苛的言论空间中生存。

宋彬彬道歉是一个试金石，它提醒我们，经济的高速发展，既不能成为历史的遗忘剂，更不能成为暴力的遮羞布。十年浩劫造成的集体创伤，远远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平复。禁止没有出路，大批判不是办法，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抛弃这些前现代的思维和手段。

2 0 1 4 — 4 — 1 5

□ 原载《记忆》第 1 1 2 期，2 0 1 4 年 4 月 3 0 日。

~~~~~

【史海钩沉】

“伍豪事件”的原委

• 阎长贵 •

我一向认为周总理在文革中是累死的，气死的，使他最生气的事件之一，就是所谓“伍豪事件”。“伍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先从文革中的后续事件说起，探讨一下它的由来原委。

◇ 文革中伍豪事件的缘起

1 9 6 7 年的 5 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在 2 0 世纪 3 0 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有人告诉他们，“伍豪”就是周恩来。他们把关于这则启事的材料送到中央文革。

于是，江青等人就把它当作投向周恩来一发重磅炮弹，开始借端发难。这就是文革中的“伍

豪事件”。

周恩来为什么又叫“伍豪”？据邓颖超秘书赵炜的文章说，五四时期，周恩来和一些热血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他们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阄的形式取代号互相称呼，邓颖超当时抓到的是一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五号，就叫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国民党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

江青拿到这则启事，5月17日，报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 x x），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周总理收到江青的信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邓颖超，他们二人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邓颖超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颖超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秘书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

报纸太多，而且是竖排，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大家耐着性子，坚持一张一张地翻。查到《时报》在1932年2月16日、17日两天刊登了这则启事，18、19日，《新闻报》刊登，《申报》——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在20日、21日也登了。周总理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则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于是大家又查，查了很多报纸都没有找到这条消息，后来还是在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周总理高兴地说：“这就清楚了。”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周总理让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所有登载那则启事的旧报纸一一拍照。

周总理收到江青的信两天后，即5月19日，在江青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日，周总理又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据说还在“存”字旁边划了重重的两道杠）

文革小组的各同志阅后，又交到江青这里。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编制的《大事记》和有关材料，用一个包袱包着，在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办公室里放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天又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取走。

1968年1月9日，我因受江青的诬陷为“坐探”，被隔离审查，以后又被投入秦城监狱。关于这件事情的后续情况我就知道了。

文革后，确切地说，1997年退休后，我在从事文革回忆和研究的过程中，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上看到，1967年12月22日，

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在1932年上海的报纸上发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在这封来信摘要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

◇ 敌人是怎样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

周总理说：“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系敌人伪造。”敌人，即国民党，是怎样伪造这则启事的？这是许多人都想弄清楚的问题——也是探讨和研究“伍豪事件”应该和必须做的工作。有幸得很，最近收到马雨农先生惠赠的由团结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大著《张冲传》，在这本著作的第三章“中统干将”中有一节《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张冲炮制这则启事的情况。“借花献佛”，我据此向希望了解“伍豪事件”始发情况的人们做一介绍。

张冲何许人也？现今中国知道的人不多了——我这个七八十岁的人都不知道。张冲，字淮南，1904年2月生，浙江乐清人。除了已经说到的“中统干将”，他还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称赞他“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在《张冲传》的封面上，有这样醒目地介绍：“蒋介石的亲密信使”、“周恩来的挚友良朋”。然而，就是他制造了几将置周恩来于死地的所谓“伍豪事件”。这就是历史真实过程的吊诡之处、复杂之处。研究历史用“直线思维”和“平面思维”的方法是绝对不行的。

张冲究竟为什么制造和怎样制造所谓“伍豪事件”？预先申明一点，请读者原谅，谈这个问题我不能不比较多地引用马雨农先生在《张冲传》中所提供的材料。

学习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顾顺章（1904年—1935年）这个人。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1931年4月被捕后叛变，他向抓住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表示：“我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说出来。这是个大计划。可以在三天内，把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全部消灭掉。不过，我不能对你讲，请你尽快安排，我要面见蒋委员长本人。”顾顺章叛变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顾顺章向国民党邀功的最主要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而张冲也就是利用这一点制造了所谓“伍豪事件”。

张冲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是这个特务组织的二号人物。顾顺章叛变后，张冲曾带人到上海搜捕周恩来等中共要人，但由于潜伏在调查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都扑了空。张冲受挫后不甘心，到1932年2月间，见中共处于困境，就与他的部下属调查科派驻上海的特派员黄凯密谋设计，他提出：“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以此来吸引更多人自首。黄凯很赞同他的想法。张冲连夜起草一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第二天由黄凯派人送上海几家主要大报刊登。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张冲炮制这个启事，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这个启事对共产党不用恶言恶语，也不刻意丑化，

完全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着想者的幡然醒悟，词意分寸，似乎比较符合周恩来这样地位、身份的人所言。正因为如此，这个伪造的启事，极具迷惑性。

◇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对这则“启事”所采取的措施

张冲挖空心思在炮制这则启事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周恩来此时不在上海。周恩来早在两个月前已撤到江西苏区。这则启事见诸报端后，留守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立即识破了这个阴谋，采取严正有力措施，予以反击辟谣。

前面已经说过2月22日在《申报》上登了一条45个字的“伍豪先生鉴”的启事，这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不过应该指出，周恩来说登这条启事“……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实际上人们并不能一下子看得那样明白。1972年6月13日，亲身经历此事的陈云回忆40年前的这段往事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黑体为笔者加）——这样说比较合理些。

中共上海地下党所采取的第二个行动，就是散发传单辟谣。2月20日。即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名义，在上海广为散发《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说：“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个行动，是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辟谣。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一篇由党组织代写的《伍豪启事》。郑重声明：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拯救国民党于灭亡的！”这一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评论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诬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第四个更有力的措施，是聘请外籍名律师代言辟谣。党组织通过关系，请当时著名的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出面，在3月4日《申报》广告栏的显要位置，刊出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文曰：

兹据周少山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电话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九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别名。这个启事，以巴和律师的名义，代表当事人澄清事实，等于公开辟了谣。巴和是上海享有盛誉的大律师，由他代言声明，不仅权威性强，而且他是法国人，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中共临时中央局连续出手，以四项举措，澄清事实真相，消解了伪造启事的影响。张冲的合谋者黄凯事后失望地说：启事登出后，“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

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的《申报》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中统的）季源溥（曾）警告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的观点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马雨农先生在《张冲传》中关于周恩来和张冲的关系还有一段话，他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张冲与周恩来的故事，成了注释这一诗句最为经典的范本。两人由不共戴天的仇敌，到风雨同舟的朋友，为民族存亡，同赴国难，演绎了一段成为传世佳话的恩仇记。”关于周恩来和张冲两人化敌为友的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篇章，但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只能另文论述。只说一点，“张冲是民国时期的传奇人物”，可惜他英年早逝，1941年逝世时只有38岁。周恩来所作《悼张淮南先生》（当时以《新华日报》社论名义发表），沉痛、生动地叙述了他们两人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以及此后国共二次合作中的公谊和友谊。周恩来这篇博文就是《张冲传》的序言。

不仅留守上海的临时中央局连续出手驳斥伪造启事，澄清谣言，江西苏区也严正驳斥伪造启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13年修订版记载，1932年2月下旬，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登载伍豪等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 伍豪事件：周恩来文革中经常纠结、终生难忘的一块心病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情况看，所谓伍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十分清楚的。从历史史实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所谓伍豪事件有三次表态：一是1932年2月，明确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二是1967年5月，批示：伍豪事件及其相关材料交文革小组阅，存；三是1968年1月，在一封关于伍豪事件的来信摘要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三次批示从1932—1968年历经三十五六年，走的是一个“之”字形。

1967年10月和12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启事”的报纸和他1967年5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68年1月10日条目注释：以下所记周的情况均见该《年谱》）——我前面说到这些材料在我办公室存了一段时间后，又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取走，大概就是周恩来索要引起的。

1968年1月10日，周写信给江青：已将“伍豪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同时，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主席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此前，13日，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发言：“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

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顺便说一下，就在这件事情即伍豪事件刚刚发生的1967年5月，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总理把这件事说了一下，“对这件事康生积极为总理证明”，“康生说这件事是敌人搞的，发生以后是由他处理的”。（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95页）

1975年9月20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凡此种种，周恩来为了他一生的清白，足见他用心良苦。事实也证明，他这种良苦用心不是多余的。

□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4年5月28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